

中共沁陽黨史

初稿上編

(1932—1949)

中共沁陽縣委黨史辦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沁阳建党和土地革命时期 (1932年3月—1937年7月)	
一	马克思主义在沁阳的传播。早期共产党人在沁阳的活动。大革命对沁阳的影响.....	1
二	沁阳建党。沁师学潮。暑期读书会。围攻县衙。沁济暴动。暴动的教训和意义.....	6
三	沁阳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的恢复。革命力量的发展。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	15
第二章	沁阳党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四	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沁阳人民的抗日高潮。开辟土河抗日根据地.....	23
五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沁阳县委的重新组建。党组织的隐蔽斗	

争.....	3 1
--------	-----

- 六 土河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沁阳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加强对敌伪军的工作。山上山下的艰苦斗争。

沁北解放。日寇投降.....	3 3
----------------	-----

第三章 沁阳党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10月)

- 七 沁阳首次解放。沁南剿匪。反奸反霸清算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 4 0

- 八 国民党反动派又占沁阳城。沁阳人民的自卫战争。土改运动再次走向高潮。沁阳二次解放..... 4 4

- 九 予西参战。沁阳群运的经验教训。支援全国的反蒋斗争。土改整党。沁阳首届党代会。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 9

第一章

沁阳建党和土地革命时期

(1932年3月—1937年7月)

一、马克思主义在沁阳的传播。早期共产党人在沁阳的活动。

大革命对沁阳的影响

党的创建是一个过程。

沁阳党的建立也是一个过程。

沁阳党初建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可是，远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沁阳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个别共产党人的活动。加之大革命风暴的深入影响，使一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沁阳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沁阳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素有“覃怀古郡，河朔名邦”之称。明太祖洪武元年在此置怀庆府，城内的覃怀书院和怀仁书院，久负盛名。民国二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定沁阳县，城内先后设立了河南省立第十三中学，河南第五职业学校以及沁阳县立师范、私立培元中学等。所有这些，使沁阳历年来成为豫北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英国和加拿大在沁阳开办电厂和医院，设立天主教堂和教会学校，施行猖狂的经济掠夺和罪恶的文化奴役。地方封建势力投靠帝国主义，

实行腐朽的反动的统治。沁阳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极端贫困、毫无民主权利的悲惨生活。长期以来，勤劳、勇敢和智慧的沁阳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可惜都失败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暴发了学生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由学生到工人，声势之大，遍及全国。当时正在沁阳省立十三中读书的一些爱国学生，发动成立救国会，游行示威，查封日货。他们不顾学校当局的除名处分，并同数十名同学到焦作、济源、温县和孟县，宣传抵制日货。他们募股在沁阳城内举仙桥口创设文化书社，以便联络各地进步组织，吸取新的思想，开展革新运动。他们又在西向广益小学成立“微光社”，出版《微光》不定期刊，反映进步青年寻求光明的思想倾向。

同时，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些北大、北师大毕业生，陆续来到沁阳十三中教书。他们大多是李大钊和鲁迅的学生。他们举办《沁声》月刊，在课堂上常讲“五四”故事及人物，如蔡元培如何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李大钊如何深入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等。他们还在师生中传播进步书刊如《通俗资本论》、《李（列）宁主义ABC》（初步）、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李大钊的《史学纲要》以及共产党的《向导》周报等等。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微妙的方式悄悄地在沁阳传播。十三中学生郭晓堂（郭全和）、郭大佛（郭文祥）、李贯之（李建通）等，就是在这里接受了科学与民主的革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然而，在沁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崇义杨介人。他原名杨介臣，字廉泉，曾在武陟木栾店商业中学读书。一九一九年夏季，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热切希望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学习与斗争的实践中，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

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断将书信和自己编印的《廉泉》季刊寄回沁阳，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后来，他又从法国到苏联学习。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杨介人便在开封以个人资格担任国民党河南省执行委员兼沁阳县代表，同时到安阳和汲县等地开辟党的工作。这期间，杨介人不断回到沁阳，在崇义组织“青年读书会”二十余人，把从苏联带来的革命书籍传播给大家。他亲自为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画像，并将画像张挂在学校教室的墙上，引导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木楼学校教书时，他带领学生用筒瓦在校园空地上排成中国分省地图，种植各种花草，在地上进行讲课，教育青年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发愤学习。

除了早期共产党员杨介人的活动外，还有开封青年协社（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的半公开的进步青年组织）社员郭晓堂曾同郭大佛等在紫陵一带组织归乡青年学生，成立“谥声社”，号召大家直言不讳，大声疾呼，揭露社会黑暗，改革社会现状。

一九二七年初在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的影响下，以郭济英（郭全隆）为首重新组建了国民党沁阳县党部（当时邻近有的县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组建国民党县党部），排除旧的豪绅势力，另用郭大佛、李贯之、郭晓堂等进步青年，宣传政治刷新，改良社会风俗。他们响亮地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封建军阀”、“打倒一切贪官污吏”、“打倒一切土豪劣绅”。县党部又派郭建中等前往郑州冯玉祥办的予陕甘农村组织训练所受训，毕业回来即成立沁阳农村组织筹备处，先在义庄水运、继而东、西紫陵、终至全县许多村庄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浪潮。

这时，由于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全国及河南的政治局面已经趋向反动。但是由于地区的差别和其他原因，大革命的余波尚未在沁阳平息。一九二八年，沁阳西北乡紫陵一带的农民革命运动达到高潮。

郭济英、郭大佛、郭晓堂、李贯之、郭舜人、郭建中等，首先发动各村组织农民协会，夺取乡村政权，清算村长的贪污账目，打倒土劣头目任全伦，抄了他的家，砸了他的“功德”匾。一时间，农民协会权力无上，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其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毁庙兴学”运动，打神像、毁庙宇、把各村的公产、公款从土劣、村长、族长手里夺过来，兴办新学校。紫陵镇在开化寺创办了沁阳县公立第一完全小学。继之而起，全县添设到二十余所完全小学。《打倒列强》的歌声，响遍村村镇镇。他们还大力提倡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提倡鞠躬，反对磕头。墙上贴的大字标语是：“天足女子有财产继承权”、“有志青年不与缠足女子结婚”。他们废除旧历年，改过阳历年。过年不准敬神拜祖，不准烧香磕头，不准蒸大饅枣花，甚至不准吃饺子。禁止贩卖迷信品，违者罚款游街。过阳历年时，大演新戏。龙灯旱船等文娛班子也到各村互演。元旦一过，便不准再过旧年。

紫陵农民运动冲决了几千年封建束缚的罗网，向着解放的道路迅跑。

但斗争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带有某种缺点的革命行动遭到了封建旧势力的切齿痛恨。他们早就在虎视眈眈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春节），土劣头目任全伦、任建楷等，勾结紫陵一带各村村长，操纵一伙亲信，煽动一些群众，对革命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一伙人闯进学校，砸坏门窗，抢走桌凳；一伙人奔至利

下二区，围攻区公所（在紫陵），将郭济英头部打伤；一伙人放火焚烧了郭大佛、郭建中家的房子，扒毁了郭济英、郭晓堂、郭舜人家的房屋；一伙人追至王村，捕杀李贯之未遂；而另一伙暴徒，手持刀枪棍棒，杀气腾腾，在紫陵村西河坝将郭建中活活砍死，造成了震惊于北数县的有名的紫陵惨案。

紫陵惨案发生后，郭大佛、郭济英、李贯之等立即组织反击。他们一面向上告状，一面开会演讲，大力宣传紫陵惨案的事实真相。同时隆重追悼郭建中，谱写《紫陵惨案》歌，还将紫陵第一完小改名为“建中小学”。在如此强大的社会舆论逼迫下，县政府不得不抓了几个杀人放火犯。可是，杀人者并未处死偿命，主谋人依旧逍遥法外。

紫陵惨案是一个革命的转折点，惨案的沉重打击反而激发了国民党左派青年的革命热情。在与土豪劣绅的多次较量中，他们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腐朽与反动。县党部内部出现了分化。郭大佛、郭晓堂、李贯之等暗自脱党，另行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青年团”，一面要离开国民党另找政治出路，一面以暗杀手段与敌方斗争。其间，郭大佛发表的《心影》、《毁灭》和《中魂》三本书，即反映了他们苦闷、彷徨、不满现状而又不忘求索的政治情绪。

毛泽东同志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紫陵农民运动是一次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巨大威力，也促成了进步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可靠同盟军——农民的结合。紫陵农民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产物。实际上，共产党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导致了沁阳的农民运动。因此，紫陵农民运动也体现了共产党的深远影响。如果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沁阳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紫

陵农民运动则在客观上为沁阳建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沁阳建党，沁师学潮，暑期读书会，围攻县衙，沁济暴动。暴动的教训和意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沈阳。东北军张学良部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之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南，日军随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日寇的侵华暴行，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甯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

在此形势下，沁阳师范、沁十三中、五职、培元等校学生，奋起响应。沁师首先召开抗日大会，该校教师李贯之在会上讲演，号召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抗议日寇侵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郭大佛到女高讲演，发动女高师生臂戴黑纱，手持红绿旗上街游行，宣传反日救国道理。郭还到沁师给学生上国文课，特意选讲了法国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从法国阿尔萨斯省的失守，联想到我国东三省的沦陷，设身处地，触景生情，感动得学生们流下了悲愤的热泪。

他们在沁师组织中秋月夜座谈会。李贯之当场朗诵了他的七律《哭辽东》，郭大佛为之润色。诗曰：

“哭罢江山无泪流， 亡国惨祸已临头！
恨尔民贼方得意， 哀此匹夫能不羞？
复我片土可百世， 杀敌一毛足千秋！
男儿一付好身手， 拼将热血洒神州。”

这首诗（解放后被收于《革命烈士诗抄》）抒发了李贯之怒对敌寇、指斥蒋贼并号召爱国志士为抗日救国而浴血奋战的强烈感情，代表了沁阳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民族气节，同时也唱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

接着，在各校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沁阳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任建樟任秘书，各校负责人有王执椿、王耀轩（王志澄）、张学杰等。联合会经常组织各校师生到城内各条大街，贴标语，呼口号，宣传抗日救国，到商店，到邮局，甚至到博爱陈庄火车站查焚日货。组织抗日话剧团、在城乡演出《秋子》、《伦敦蒙难记》、《卧薪尝胆》等。成立沁阳学生抗日义勇军，定期集中操练。在城东门外广场举行大检阅，《打倒列强》歌高亢嘹亮，学生队伍威武雄壮，抗日情绪无比高涨。自此，全县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同年十月，郭大佛到开封同河南大学反日救国委员会主席郭晓堂等商量救国工作和政治前途问题，准备武装保家卫国。于是，他们在开封开办了秋水书店，由郭济英担任经理；郭大佛则回到沁阳担任了义庄六区副区团长，郭舜人任队长，从而掌握了该区武装。

开封秋水书店出售的多半是进步书籍，如《马克思十二讲》、《母亲》、《新生命》、《苏联五年计划》、《莫斯科印象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呐喊》半月刊等等。书店跟北平、上海均有采往。有时一次就寄来一二百元的革命新书，寄来就卖。买书的，看书的，络绎不绝。郭晓堂等利用星期天，给前来看书的学生推荐进步书籍，讲授革命道理。书店里还专门购置了一台油印机，经常油印革命传单，让可靠学生到处散发。

秋水书店是革命的联络站。郭晓堂、郭大佛，李贯之等利用秋水书店向社会各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自己也从中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营养。

如前所述，紫陵惨案是一个革命的转折点，它使沁阳国民党左派青年脱离国民党，另谋新生路。而“九、一八”事变则象催化剂一样，促使他们进一步向左转变，向革命队伍靠拢，以致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

这年秋冬，郭大佛、李贯之通过沁师的两名济源学生共产党员，同济源党组织取得了初步的联系。

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城北北街郭大佛家里，成立“青年反帝大同盟”。为了对外方便，采取“青”字“月”、“盟”字“明”而称“月明读书会”，以此团结进步青年，组织革命力量，将其引向马列主义的革命轨道。除了郭大佛、李贯之外，还有任建樟、郭英、黄本昆、王执椿、尚思光、王濯轩、周瑞麒、张世纲、马纪民等十余人参加。

月底，郭晓堂和陈隄（齐欣）由开封返回沁阳，同郭大佛等商量积极寻找共产党来领导自己闹革命的重大问题。为此，二月七日，他们又成立了秘密团体“二七社”，表现了沁阳革命青年寻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强烈愿望和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正当沁阳有志青年盼党心切的时候，济源党的负责人党继新及时介绍郭大佛到开封与省委杨斯萍接头会谈。杨介绍郭大佛参加了共产党。随即，省委派李新民来沁阳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二年三月，李贯之、任建樟、郭舜人、黄本昆、郭英、王执椿、周瑞麒等，分别在紫陵开化寺、沁阳城北街以及关帝庙参加了共产党。尚思光等加入了共青团（当时党团活动不分），从而建立了中共沁阳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郭大佛任沁阳党支部书记，任建樟任沁阳团书记。（郭晓堂和陈隄在开封相继加入了党组织）。

中共沁阳党支部的建立使沁阳的革命斗争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勤劳善良的沁阳人民终于从茫茫的夜空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苦难

的挣扎中感到了翻身的希望。

党支部成立后，即决定在沁阳师范创办墙报，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墙报题名为“沁师园地”，由任建樟、黄本昆、王执椿负责编辑。没多久就办了三期，主要刊载关于抗日救亡的文章，诗歌及有关党的方针政策。沁阳师范无形中成了党组织活动的主要战场。

为了发展进步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党支部以“二七社”的名义，在城内东北角火药局召开会议，与会的除党团员外，还有王耀轩，马纪民等共达二十余人。郭大佛在会上宣讲了当前抗日救亡的形势，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蒋介石的无耻卖国，指出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不久，沁阳形势发生了突变，国民党右派势力勾结省府要员及地方豪绅控制了沁阳局势。教育局长及各校校长均被撤换。新任沁师校长采用沁师从未有过的放寒假的办法，企图安插亲信，打击革命势力。因此，沁阳党支部立即组织力量，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

沁阳团书记任建樟首先组织学生向县政府请愿，不要王理当沁师校长。而反动当局对此正义的要求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因而党组织决定驱逐王理，以武力夺取沁阳师范的领导权。那天，沁师进步学生把王理轰出教室，继续追打，在校门口将其打翻在地，使他的校长宝座终究未能坐成。事后，反动当局在学校挂出牌子，开除了任建樟、黄本昆、郭英、王执椿四名同学，又派军警前来抓人。可是，闹学潮的党团员及进步学生早已按照原定的计划分散行动，先后到沁阳西北乡集合了。

这次学潮，乃是沁阳党领导革命力量对反动统治阶级的第一次胜利的出击，显示了党支部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坚定了党组织率领人民

群众披荆斩棘的必胜信念。

沁师学渐之后，党团员及进步青年学生陆续来到紫陵。

紫陵是个大村，俗传“任一千，牛八百，其他杂姓还不说”。这里地处偏僻，位于予晋两省及沁（阳）、济（源）、晋（城）三县交界，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薄弱，便于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根据省委关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沁阳党支部在紫陵开化寺举办“暑期读书会”，进行秘密的也是半公开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参加读书会的党团青年有二三十人，筹集公私长短枪一二十支。群英聚会，人才济济，读书训练，共谋大略。他们从开封秋水书店弄来大量的革命书刊，如《北斗》、《铁流》，鲁迅的《呐喊》、高尔基的《母亲》等等，竞相传阅。读书会上，由李贯之以及后来的郭晓堂给大家上政治课，讲辩证法入门，唯物史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由郭舜人给大家上军事课，讲解步枪与手枪的使用方法，利用地形地物等知识，还教练了省委发给的介绍苏联红军游击队作战经验的小册子《游击队如何动作》。他们在学校站岗放哨，到山上行军打靶。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和睦相处，津津乐道，讲抗日，谈革命，传颂红军故事，展望美好前景。热情而又主动，严肃而又活泼，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温暖着每一个革命者的心田。

党支部把紫陵、赵寨一带原参加农民协会的一些人重新组织起来，成立贫农团。由会武术的人教练耍棒、打拳、单刀、双剑，逐步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

郭大佛、郭舜人以义庄六区为中心，利用多种关系，联络周围几个区的民团，积极组织武装。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已有三四个区可以有把握地夺取过来。

从此，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扩大到贫苦农民和士兵，队伍的成份产生了质的飞跃。

读书会期间，党支部又发展了一些党员。杨介人在沁南发展的个别共产党员也曾到紫陵同沁阳党支部发生关系。

这时候，党组织果断地处决了紫陵惨案的祸首任国弼和任智德，在尚香村西枪杀了土劣头目王向琛。

沁阳党直接领导的暑期读书会，不仅为发展武装斗争，开辟新苏区作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必要准备，而且为党的事业培育了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紫陵因此而不愧为沁阳革命的摇篮。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独夫民贼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自任围攻军总司令兼鄂予皖围攻军司令，坐镇武汉，调兵遣将，重新纠集六十三万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中，在皖西歼敌三万余人，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这次“围剿”首先集中于鄂予皖苏区。

在如此严重的形势下，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北方各省代表会议精神，一面发动白区人民尽力募捐各种物品以慰劳红军，一面紧急布置全省的总暴动，为牵制予北敌军南下，省委制定了“予晋边游击战争计划”，发动济源、沁阳、焦作、武陟等地的武装暴动，借以和鄂予皖红色苏区南北呼应，对大批“围剿”之敌形成掣肘，夹击之势。随即，省委特派员张同志赶到济源，在石河村主持召开重要会议。与会者党继新、翟茂林、郭大佛等七人。会上传达了省委“予晋边游击战争计划”，决定成立一个红军游击支队。下属三个大队，即沁（阳）济（源）大队、焦（作）武（陟）大队和道口大队。由沁济地区首先发动，然后向东，与其余大队会合，开辟予晋边新苏区。

为贯彻省委指示精神，沁济两县党组织在紫陵开化寺成立沁济临时党总支，由予北特委书记党继新兼任总支书记，委员有郭大佛、苗既平等。临时总支又在紫陵开会，决定于农历八月中秋举行武装暴动。

接着，郭晓堂被省委派回沁阳，再次向党支部传达了省委关于准备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郭在沁阳城还组织了一场包围县衙的斗争。城内数百名回民游行示威，包围县府，取得了城壕地永佃权的胜利。这场斗争，为沁阳党提供了一条领导农民斗争的成功经验。

正当沁阳党组织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我地下省委因叛徒告密遭到了严重破坏。河南绥靖公署刘峙密令各县同时搜捕共产党。沁阳县政府开动城内全数驻军一连人，突然将紫陵包围起来。由于敌人行迹败露，读书会的党团青年均已安全转移。正居丧在家的郭大佛当场拒捕逃脱，偕同党继新潜赴郑州，原想向省委报告，可得到的却是领导同志被捕牺牲的噩耗。他们再奔开封，幸迁省委李新民谈到暴动问题，李却不置可否。郭大佛又在郭晓堂那里谈了一夜，深感只有武装暴动，别无生路可走。第二天，开封秋水书店被查封（郭济英被判无期徒刑）郭大佛与党继新转到许昌，拟奔鄂豫皖苏区。谁料许昌新遭破坏，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在深沉的悲哀和极度的愤慨之下，为使省委既定的暴动计划不改于就此无声无息的葬送，郭大佛和党继新果断决定返回沁阳，至少拉出一部分枪支，以一隅的赤色恐怖答复刘屠夫残酷的笼罩，以此表示河南的共产党还没有被屠杀净尽！

回到紫陵后，党继新、郭大佛和郭舜人，任建樟当即决定，乘其不备，出其不意，提前举行武装暴动。

九月六日夜，党继新、郭大佛率领任建樟、黄本昆、秦振山、吕存亮、张世纲、任在纲，以及赵寨的张启亮、张启祯、张良全、李良

永、张启恩、张小随等十数名青年农民，手持刀枪，直奔义庄。在郭舜人的接应下，砸了区公所，拉出区团队，成立了予晋区红军游击队，公开举行武装暴动。

队伍从义庄出发，西经紫陵，转至沁济交界的遂寨村。随将土豪李建申（李的儿子也在队伍之列）的粮食、财物分个净光，当地群众欢天喜地。

为了同济源取得联系，党继新、郭大佛、郭舜人、任建樟和秦振山五人一起，化妆渡河西上，在新庄组织力量，奇袭武山镇五区民团，首战告捷。旋即到勋掌、北社发动群众，又成立了予晋区红军游击队第七大队，将沁阳定为第四大队。郭舜人为总队长。党继新（化名李天德）任政治主任。郭大佛（化名高达天）任军事主任。任建樟任第四大队队长。当第七大队军次沁河西岸，准备渡河东进时，第四大队在敌人的围攻下被迫解散。之后，予晋区红军游击队即以原大寨为革命根据地，依托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沙河沟、北社、勋掌及岭西一带，主动出击，打富济贫，镇压大恶霸，摧毁旧政权，组织纠察队，大战三义场。根据地扩大到东西四十里，游击区竟达方圆百余里，在济源的西北乡形成了苏维埃区域的雏形。

沁济暴动震惊予晋两省。十二月中旬，国民党调集军队与沁、济、孟等县反动武装数千人，疯狂围剿原大寨。我红军游击队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跳崖突围。撤退出来的三十多名战士，在郭大佛的领导下分散隐蔽。

沁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党继新、任建樟、郭舜人、苗既平等，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沁济暴动失败了。

如若无视暴动的奇迹而盯着失败的结局，或者不顾斗争的实际而

单凭随意的推想，即对沁济暴动予以过多的评头品足，甚至冠以“富农路线”、“军事冒险”、“上山主义”、“侠义行为”等罪名，或者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某个个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郭大佛在向上级党的书面报告中写道：“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失却上级的领导和无从补充军实，这两个困难是原因中的原因。”这话并非没有道理，然而需要补充，因为只强调客观上的原因而不吸取主观上的教训，也是不全面的。

其一，缺乏党的正确领导。沁济暴动之后不久，省委李新民（李剑森）在上海直接写给党中央的“十万火急”的报告信中说：“我来沪是要解决河南问题的，尤其是济源沁阳的游击问题”，“现在，加强这一游击队的政治领导，成为第一等重要的而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河南省委在暴动期间尚未恢复，致使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沁济暴动的领导人只顾请求上级领导，却忽视了游击队党组织的健全和发展。结果，上级领导没有来，游击队本身党的领导也较薄弱，因而丧失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和胜利的根本保证。

其二，有单纯军事观点。这种在游击战争的紧急形势下貌似有理的错误观点，象一层网膜在一定程度上障碍了暴动领导者的视力。他们只看到群众分粮吃大户的眼前利益，却忽视了武装广大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步骤，致使游击队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群众，犹如失水之鱼，难以持久。

当然，左倾路线的影响不无存在，暴动中明显地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还不少。但如列宁同志指出的那样：

“我们工人阶级用其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定能夺得欧州的光明，让那些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庸人俗子以不犯错误为骄傲吧！”

中共河南省委对沁济暴动作了认真的总结，指出：“沁济暴动虽